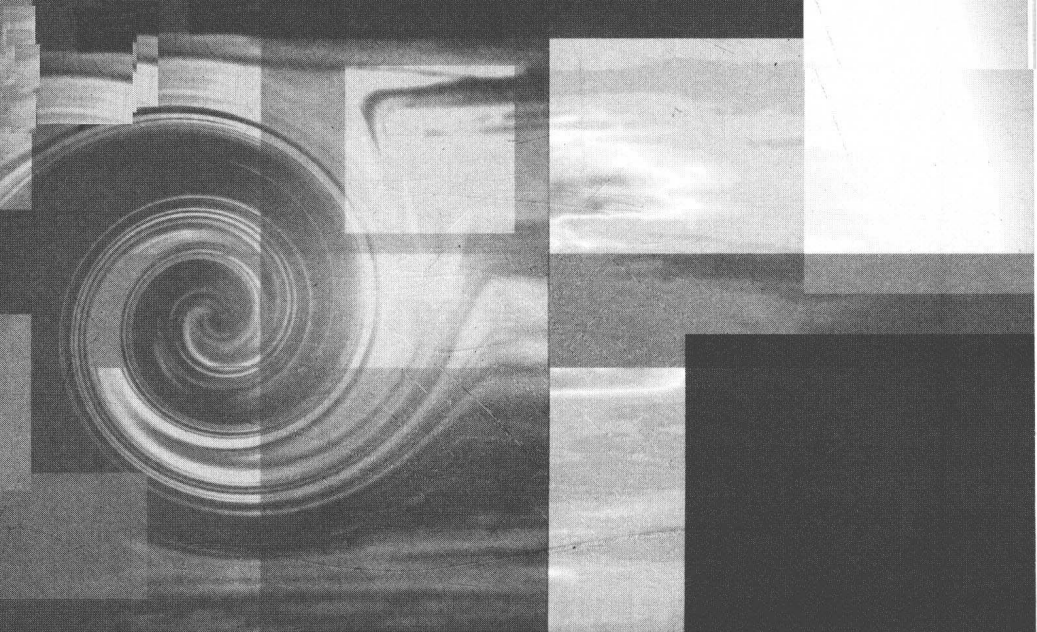




中国转型

和谐与冲突

郑永年 著
杨丽君 编

透视中国系列丛书之六



前言



本书收集了郑永年先生过去三年多时间里先后在香港《信报》“中国局势”专栏和新加坡《联合早报》“郑永年”专栏发表的有关中国政治的评论文章。在这段时间里，江泽民退出领导岗位，胡锦涛和温家宝新领导层逐渐确立了新的改革方向和路线。在江泽民主政之下，中国高层的主要政策议程是经济改革。在江泽民后期，高层提出“三个代表”概念，力图引入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但在整个九十年代，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这尤其表现在对民营企业政治地位的承认和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上。胡温主政以来，对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方向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如郑永年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尽管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这个单向面的发展也产生方方面面的负面效果，如社会分化、环境恶化，腐败等等。如果不对经济改革方向进行调整，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胡温领导层把重点放在调整经济改革的方向上。在这段时间，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重点，包括社会福利、医疗制度、收入分配等等。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进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在过去的



几年里，胡温也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努力，但总体上说，政治改革从属于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就是说，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还是主体改革。从长远观点来看，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可以为将来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一个社会经济基础。

在编辑整理过程中，编者把文章分为十一个方面，包括政治制度创新、精英制度变迁、执政党转型、意识形态重建、文化软实力、中央地方关系、发展与分化、社会公正、社会力量崛起、教育改革和香港民主化等。这十一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郑永年先生的内政关切点。编者除了对个别文字作了纠正外，所有文章保持原貌，并且注上发表日期，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反映作者对当时的局势的看法。

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感谢《信报》和《联合早报》诸位编辑的帮助。特别要感谢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的潘国驹教授。潘教授建议把郑永年先生的文章编辑成册。八方文化企业公司的冯婉明编辑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建议和协助。

杨丽君

2007年7月于英国诺丁汉





目录



前言

iii

第一章 利益开放、制度创新与政治改革

1

一、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1

二、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4

三、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7

四、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10

五、中国政治改革的新动向

14

六、治理利益社会需要开放政治

17

七、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20

八、政府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

23

九、政治改革要以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

26

十、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29

十一、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32

十二、要正确处理内外部改革之间的关系

35

十三、中国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37



第二章 变局中的精英政治	41
一、赵紫阳与当代中国之命运	41
二、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44
三、胡耀邦、赵紫阳与中国政治的平衡	46
四、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49
五、中国权力交接班制度的深化	52
六、为什么又传出中共权力斗争说	55
七、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58
第三章 过程开放与执政党转型	63
一、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63
二、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66
三、中国的转型与对执政党的新挑战	69
四、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73
五、朱镕基的铁腕与温家宝的泪	76
六、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79
七、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82
八、中国干部管理制度有待改善	84
九、对干部“知识化”的质疑	88
十、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91
第四章 人本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复兴	95
一、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95
二、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98



三、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101
四、为什么中国要走人本社会主义道路?	105
五、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107
六、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选择	111
七、回到邓小平?	114
第五章 文化崛起与道德重建	119
一、为什么要追求“文化崛起”?	119
二、中国要追求怎样的内部文化崛起?	122
三、谁最需要孔子学院?	124
四、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128
五、道德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131
六、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1)	133
七、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2)	136
第六章 中央地方关系向何处去?	141
一、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重建	141
二、中国中央集权要有制度创新	144
三、地方制度创新要求改革中央地方关系	147
四、谨防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权地方化	150
五、中国:是谁“瓜分”了中央的权力?	153
六、中国要建设现代国家制度来解放人民	156
七、依法行政与维护中央权威	160
八、“浙江模式”值得深思	163



第七章 发展、分化与腐败	167
一、“发展”就是硬道理	167
二、民生经济是中国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170
三、中国收入分配的制度缺陷	175
四、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178
五、中国企业改革战略出了什么问题	181
六、从外部贸易纠纷到内部贫富分化	185
七、谨防既得利益对政权的挟持	187
八、腐败与战争	190
九、矿难、国家与执政方式	193
十、赌场、核武与民主	196
第八章 公正、正义与和谐	201
一、为什么要提建设“和谐社会”？	201
二、社会的分化要由民主来纠正	204
三、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207
四、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要求社会正义	210
五、中共的公平经济学	213
六、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和谐社会	215
七、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219
八、五中倡议社会主义新农村	222
九、中国和谐社会有待于进一步制度创新	225



第九章 转型中的社会力量	229
一、中国社会改革应当扶植社会力量	229
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	232
三、开放社会对封闭政治的挑战	235
四、如何认识目前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	238
五、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崛起说明了什么？	240
六、一场社会革命蓄势待发吗？	244
七、“颜色革命”触发第四波民主浪潮？	247
八、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	250
九、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呈现“病态”？	253
十、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256
十一、“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	260
第十章 教育改革及其后果	265
一、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	265
二、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270
三、中国教育改制面临制度制约	274
四、高校巨债折射出中国决策体制的弊端	277
第十一章 香港民主化与国家整合	281
一、香港的“另类民主”化	281
二、中央的香港政策应当转变	284
三、要对香港民主化进行理性考量	287



四、董建华辞职：谁的管治危机？	290
五、香港管治与政党政治	293
六、香港能否回到港英管治模式？	296
七、香港的大局面与大趋势	299
八、香港政改方案流产后的政治思考	301
九、港澳管治模式中的经济因素再考量	305

郑永年的其它著作	309
----------	-----



第一章

利益开放、制度创新与政治改革

一、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是什么？民主化可能是个不可避免的大方向。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民主的实践，但总体上来说，民主还是停留在可求不可得的地步。很少人会相信国家层面的民主化很快就会到来。不过，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民主化的压力。原因很简单，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开放的政体。

如果说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民主化未能成为现实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追求民主只局限于少数精英人物中间，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来追求的，中国社会整体并没有巨大的民主要求。当总体社会还是封闭的情况下，很难要求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政体。

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民主对政权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当政者还没有很大的推进民主化的意愿，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拒绝民主化会有很大的代价。民主化涉及到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问题。领导层的代际的变化不可忽视。毛泽东、邓小平属于政治强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革命，社会上很少有人会对此置疑，也很少有人会对他们所享有的权力构成挑战，即使有，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但在后强人时代，政治领导人必须把其合法性基



于人民的意志之上。胡锦涛新领导层执政以来一直强调以人为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意志的重要性。

没有民主，政权运作的有效性也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这里最主要的是体制性腐败。反腐败运动年年不断，但腐败还是每况愈下。从江泽民时代的强调法制和法治到最近几年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约，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掌权人物没有外在的制约。政权的封闭性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最大。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黑社会化的现象，并且越来越严重。民主当然消除不了腐败，不过包括开放的媒体在内的诸多民主实践能够对政权的腐败构成相当有效的制约。

政体的封闭性也影响政权和人民之间的沟通。政权不向人民开放，政府的意志就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政权本身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性的“新阶级”。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政权就必然和社会失去相关性。而一个与社会不相关的政权很难说会有强大的合法性基础。

政权是封闭的，其制定的政策即使具有良好的愿望，也很难转化成为社会的现实。在后强人时代，很多很好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下去。仅就收入再分配为例。新一届政府非常及时地提倡亲民政策，把政策的重心从以往的新兴社会阶层逐渐转移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但现实的情况是，各种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弱势群体的人口不是在减少，反而在迅速扩大。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本意很好的中央政策就在各种既得利益的周转中消失了。

在政权还继续是封闭的时候，社会各阶层则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参政要求。最显然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的中产阶



级的人数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来的参政要求则是巨大无比的。这些新兴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对政权产生莫大的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进，不仅给与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给予新兴阶级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则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传统社会阶层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愿。相反，一旦当他们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之外，他们就会努力追求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包括上访、示威游行，甚至具有暴力性质的各种行为。这种情况已经在近年表现得非常清楚。

因为社会的压力，最近几年政权开始体现一些开放性。但政权的开放性往往过于被动。政权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向一部分知识分子开放，都是为了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自然，这种被动的开放会对政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领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在政治领域也有好的政治开放和坏的政治开放之分。好的政治开放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而坏的政治开放是一种不均衡的参与。参与越不均衡，负面效果就越大。

不均衡的社会参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中国的政体越来越像官僚——资本体制，官僚和资本合二而一，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管治。这种政治形态表面上较之毛泽东时代官僚阶层垄断一切的形态开放，但这种开放性并不代表政治的稳定性。如果说，毛时代，对任何社会而言，都是政治上的贫困，那么现在的状态则是政治上的贫富分化。后者并不见得比前者更具合法性和稳定，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政权的解体很能说明这一点。



不过，可以让人些许乐观的地方是，目前中国不均衡的政治开放形态可能只是过渡性的。如果政权在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之后，再逐步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最后可能达成全面的政治开放，即政治开放均衡化。不过，从非均衡的政治开放过渡到均衡的政治开放并非是一个自然的政治发展过程，它需要当政者自觉的政治改革。现在还不知道这种过渡如何进行，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没有这种过渡，政治很快就会进入一个不稳定状态。

（《信报》2005年7月26日）

二、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很多年来，每当中国召开“两会”和党代表大会或者年度党的全会的时候，海内外总有一波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热潮。今年也不例外。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一篇长文已经引出了海外观察家有关政治改革的热议。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政治改革的任何具体的根据，但这些猜测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治改革的客观压力是存在着的，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这种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要消化压力，那么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外界所见到的则是改革压力的增加，而不见人们所预见的政治改革的出现。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象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急进的政治改革，这是显见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今天中国的政治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中国还是原来的政治结构，其它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的总体政治结构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结构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这些部分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这里至少牵涉到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政治本身的变化方式，另一个是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变化的方式。从前者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反对中国学习西方政治模式，强调寻求适合自身情况的政治变革模式。这种政治共识实际上并不是中共领导人所独有，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效法英美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政治的努力失败后，就走上了寻求中国政治变革模式的道路。尽管后来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探索政治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拒绝西方总体政治模式并不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在局部方面来借鉴西方模式。今天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很多方面的政治设计都和西方有关，至少很多原初思想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

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现存的模式可以让中国仿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中国的政治变革正在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这里就又直接涉及到一个人们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的问题。实际上，当人们（尤其是在西方）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毫不例外地会去参照以往其他国家所发生过的政治改革方式，有参照西欧北美的，有参照亚洲国家的，也有参照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现在有人甚至去参照越南的。结果是很显见的，人们或许会发现中国政治变革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类似于这些国家的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并没有走任何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这样，很容易得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的结论。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种参照方式并无助于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在以往将近三十年时间里是如何变化的。未来中国政治怎么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如何解释过去的变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未来的变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隐含在过去的变革过程中了，只不过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要认识中国政治变革可能要从前面提到的结构不变但内容已经巨变这个事实入手。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个结构是如何得到维持的？这个结构为什么能够承受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变对这个结构产生了如何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作复杂的学术讨论。但简单地讲，这个结构的维持、发展和变化主要依靠的是这个结构的渐进开放性。

中国现实存在的结构或者政治体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不管人们如何评介这个历史事实。在早期，因为革命的需要，这个结构是封闭的，它只是开放给革命的主体，即工人和农民。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毛泽东搞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要求这个结构继续是封闭的，因为顾名思义，阶级斗争就是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斗争，结构自然不能向那些被斗争的阶级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结构才逐渐开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除了原来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之外，首先向知识分子开放，因为这个群体被视为是解放生产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和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这个结构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向企业家阶层开放。结构的开放很显然反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组成上。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委员都是来自工人、农民和政府官员。但现在这个构成已经非常不同。当然，其它方面的一些政治变革如各种形式的选举也是开放性的体现。

结构的开放性提供了执政党巨大的动力来调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开放性是政治变迁的总体方向，但开放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开放的过程不长，开放的制度性还是很低，各种规则有待于制定和完善。由于开放性背后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



开放的程度往往受背后的利益的影响很大。再者，正是因为开放往往是背后的利益促成的，结构本身很自然倾向于其背后的利益。比如这些年新兴社会阶层就成了这个结构内部的显性利益，甚至出现利益表达过度的情况，而原来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它一些新兴的弱势群体则利益表达不足。正因为如此，这次两会期间，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在两会的界别。这也是客观政治的需要。

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每一步开放的背后是利益之间的较量。这种开放的性质当然和西方政治的开放性有本质的不同。西方政治本身就必须具有开放性，因为民主和选举过程的存在，各政党如果要取得执政权，就必须有最大限度的开放，就是说用开放的方式来获得选民的支持。但在中国，政治结构的开放性是由执政党本身掌控的，开放的过程是个管理的过程。正是因为是个管理的过程，执政者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掌管政治过程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开放程度。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治开放过程呈现渐进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结构如果要达到良治或者社会的和谐，开放的过程就必须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义和公平性。因为只存在着一个结构，如果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或者说不同的利益没有公平的机会表达于这个结构中，那么良治和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联合早报》2007年3月13日）

三、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不久前召开的十六大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及其中共高层随后发表的各种解读文章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切关注。其中，讨论



最多的就是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四代会不会把中国政治推向民主化的道路。四中全会的决定是要强化执政党能力，民主并不是这个决议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外界还是要从中寻找有关民主化的可能性呢？

主要的还是人们对中国民主化的高度期望。这个期望已经持续了世纪之久，不会轻易退去。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期待一直在升高。也可预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度变化，这个期待还会继续下去。不过，人们对第四代领导层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期待似乎特别高，因为“人民”不仅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层的政治话语里，并且成为了政治话语的中心。那么，“人民”话语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会往民主化方向发展呢？

如果留意到十六大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些讲话，包括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上的讲话和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第四代领导人的民主观或者说这一代领导人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这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中国领导人的一贯立场。什么是领导人心目中的西方式民主呢？不走西方式民主从前主要有两条：一是不要有多党制，二是不要有三权分立。现在又加上了第三条，那就是中国不走俄国、东欧式的激进民主化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四中全会把执政党的改革视为是中共高层的最高日程，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它表明高层对执政党改革的迫切性已经有很高的认识。不改革，就要发生执政危机。

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变革经验中，中共学到了足够的教训。邓小平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后，就认为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那里的政权

